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八)

(解放军)
胡居成

江南捷报频传

7月后,正是江南梅雨季节,淅淅沥沥不大不小的淫雨,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和烦恼。

项英却与此相反,先遣支队和第一、二支队开进江南敌后,虽然人数少,武器差,但指战员们士气高昂,捷报频传,给项英带来无限的兴奋与快慰。

6月8日,陈毅带一支队与粟裕的先遣支队在高淳县固城湖边会合,粟裕向陈毅作了5个小时的汇报,使陈毅对江南敌我友情况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先遣支队于6月15日胜利完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交与的“破坏南京至镇江间铁道,以阻京沪之敌”的破击任务后,粟裕当天向陈毅谈了自己的想法。日军占领徐州后,即调兵遣将向武汉进逼。从南京到镇江的公路上,日军的车队来往不断,每天平均有二三十辆。他们准备在这段公路上,袭击一次日军车队。陈毅听了频频点头,立即回答:“这个方案很好。这里地形你比较熟悉,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间打,由你确定。”

6月16日,粟裕由高淳回到先遣支队驻地句容县金家边,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了陈毅的指示,经过细致周密的研究,决定在镇江西南30里处的韦岗,伏击由镇江或句容来的车队。那里山高、路窄、林密,既便于隐蔽,又便于攻击。说打就打,当日夜晚,粟裕部署,除留一部兵力在金家边,其他人员轻装冒雨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进入阵地。8时20分,从镇江方向开来5辆日军的汽车,为首的是一辆轿车。战士们心中暗喜:“鬼子还真开通,头一仗就送一个大官给我们作见面礼!”当车队进入伏击区,粟裕高喊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榴弹猛打猛轰,日军车队顿时陷入我军密集的火网之中。韦岗战斗毙敌土井少佐以下13名,击毁军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日钞7000余元,军用品4车。韦岗战斗是江南新四

军首次作战,在沉闷的沦陷区如同突然炸响的一声春雷。陈毅赋诗庆贺: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项英写来祝贺信: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基础,我们正在全军表扬,号召全军学习。”

蒋介石亦致电叶挺:“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此后,在苏南敌后,特别是在京沪铁路、京芜铁路、京杭国道两侧,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发扬近战、夜战特长,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6月至8月,先后取得了新丰、新塘、句容、珥陵、高资、仓头、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

今项英高兴的还有第一、二支队对地方抗日武装的争取扶植和对“游吃队”的瓦解收编,既扩大了抗日力量,又为民除了害。

陈毅在高淳县固城湖畔和粟裕会合时,曾面对地图对茅山和它周围的武装作过一次讨论研究。这里大部分为平原水网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从战略地理看,它南接磨盘、丫吉、瓦屋诸山,直走朗溪,楔入皖南;北望保华山脉,左据南京,右扼镇江,既可控制长江天险,又可虎视京沪、京芜两条铁路和京杭、溧武两条公路,确是雄据东南、屏障江左的要地,只是新四军来晚了一步,县城重镇被日军占领,广大农村也被多如牛毛的保安队,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游击队等等霸占。粟裕指着地图给陈毅介绍几支比较大的武装。茅山西边小丹阳一带,是朱永祥的游击队,一千来人枪;茅山南边,溧武公路附近,是程式正的游击队,也有近千人枪。粟裕摇头苦笑说:“这两支游击队都是三战区正式任命的,可是他们的纪律最坏,不打鬼子,专抢掠百姓,被

群众称之为“游吃队”。先遣支队路过他们的地盘时，他们还一定要我们留下‘买路钱’。

陈毅说：“这些队伍扛着三战区的牌子，将来可能是个麻烦。”

粟裕又在茅山周围指指点点说：“金坛的吴甲寅，磨盘山的许维新，句容的樊玉琳，丹阳的管文蔚、贡友三，茅麓公司的纪振纲，江阴的梅光迪、朱松寿等等，都有成百上千人枪，各占一方。”

陈毅边听边沉思，说：“我们到江南来抗日，光靠我们是不行的，必须把这些队伍联络争取过来，像到某地宿营那样，把他们按顺序收编起来，发委任状给他们，这样我们队伍就壮大了。”

6月12日，陈毅来到溧阳竹箦桥。在这里，陈毅召开了有机关干部、战地服务团员、连队干部参加的会议，对部队进入苏南敌后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最后，陈毅风趣地说：“毛主席说，我们要学会放‘高利贷’。我看，我们今天就应该开始学习。在江南，这种高利贷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一本万利，一种是无本万利。大家都见到了，江南有这么多游击队，大大小小的‘司令’多如牛毛。三百五百人枪的是‘司令’，三十五十人枪的是‘司令’，三个五个人两根三根枪的也是‘司令’，连上茅坑都碰到‘司令’。”几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陈毅自己也笑了。待大家静下来，陈毅继续说：“这些司令，有地有粮，有人有枪，我们把他们联络争取过来，这就叫无本万利。”

接着，陈毅又给大家解释了“一本万利”。他说，南京失陷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仓皇溃散，在茅山地区遗弃了许多枪支弹药。这些枪支弹药除了被韩德勤和“忠救军”搞了一部分去苏北和路东，“司令”们搞了一部分“占山为王”外，还有不少散落在群众手里。江南群众深受侵略者蹂躏，想抗日而苦于无门，苦于没有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带领他们一起战斗。现在，这副领导抗日的担子就落在我们新四军身上。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这项工作。我们派出去一个人，一个班，一个排，就想办法带回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的枪支弹药和新四军的新战士来。这个，就叫做一本万利。

陈毅宣布了各部队活动的大致地区，并分派了由机关干部、服务团员、连队副指导员和宣传战士组成的宣传小组，去各地做“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买卖。还要求各组之间开展竞赛活动，看谁的买卖做得多，做得大。

几天之后，派出去的宣传小组陆续回来了。去丹阳北部联系管文蔚的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先作了汇报。他说，管文蔚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在发动农民起义中被捕，与党失去了联系。国共合作抗日后，他被从监狱中释

放出来，在丹北家乡拉起了队伍，和鬼子打了几仗，名声大振，队伍越拉越大，现有一千多人。陈毅问：“他的态度如何？”刘炎兴奋地说：“好得很哩！我谈到新四军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就是：‘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若陈司令不嫌弃，就收编我们吧！我们现在非常缺少会带兵打仗的人！’”

“好。”陈毅高兴地说，“不愧是老党员！我写封信，你带给他，再带上几个干部去，把这支队伍改造为新四军。”

去句容第三区联络争取三乡联防自卫队的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王丰，带着“联防司令”樊玉琳一起来了。樊玉琳自幼读书，国民党党员，当过句容县第三区区长。日军占领句容县城，国民党军队溃退，他就在本区拉起了三乡抗日联防队，发展到700多人枪。他虽然参加过国民党，又在旧政府中任职，但他爱国，深知国民党腐败，迫切要求在新四军领导下施展宏图。

一见面，陈毅就热情地对樊玉琳说：“你的情况粟司令都给我说了，我们一起来收拾茅山这个局面吧！”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陈司令对一个小小的区长会说出这样很有分量，很亲热的话，樊玉琳大为激动。但樊玉琳是个重实际的人，他今天来见陈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陈毅到底有多少人枪，外面传说“陈毅7条枪进茅山”。7条枪就能和他樊玉琳“共同”收拾局面，这不是笑话吗？

陈毅觉得樊玉琳虽饱经忧患，但比较热情，虽讲求实际，但比较灵活，虽有地位，但不傲气，对这样的人是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完全可以把她争取到抗日阵营里来。陈毅笑着告诉他，新四军的力量是不大，武器更破败，但是为了收拾江南混乱局面，即使用血肉之躯去迎战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即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决不后悔，决不胆怯，决不退缩。还告诉他：新四军战士都已挺进到各据点和交通要道沿线，寻找敌人作战去了。就连司令部、政治部的参谋、政工人员也都出去宣传抗日去了。

晚上，陈毅和他继续深谈，一直谈到鸡叫三遍，东方发白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起来，樊玉琳毫不犹豫地陈毅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决不会甘心当亡国奴的。我愿意和你们共同抗战。欢迎陈司令到我宝坨去。”

在联络争取中也有碰钉子的。战地服务团一个宣传小组到茅麓公司要求拜见经理纪振纲时，纪振纲非但不见，还传出话来：“什么新四军，新五军，我见得多了。我靠做生意吃饭，什么党什么军队也不沾边。”宣传小组被

拒之门外，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又奈何不得。

纪振纲为什么会这么硬？经了解，此人老家在湖北英山县，辛亥革命后当过新军军官和黎元洪的兵监部长、高级参议。1917年他弃官来到上海，在南京一位官员帮助下，在茅山脚下，用“40万投资”买下一块地皮，开了个茅麓茶叶公司，自任经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20年后，他成了江南有财有势有资望的民族资本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防匪保家为名，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自卫团，配备几十挺轻、重机枪，还有两门迫击炮，200多支步枪也都是新式的，成为茅山地区举足轻重的实力派。苏南沦陷后，住在丹阳城里的鬼子要把他的队伍编成伪军，“忠救军”任命他为“副司令”，三战区也多次对他封官许愿，他都“纪某只做生意，不入军界”加以拒绝。

陈毅听了宣传组的详细汇报，认为纪振纲不畏强暴，不贪高官，拒日寇汉奸于千里之外，真是条硬汉子。至于他不肯见我们，是因为他对新四军不了解。陈毅决定亲自去说服纪振纲，把他争取过来。

陈毅单骑来到戒备森严的茅麓公司大门前，名片递上去不一会儿，里面传出一连串的“请”字。纪振纲是个商人，又在政界混过多年，城府很深，他见名片上写着新四军第一支队少将司令陈毅，就不敢怠慢。陈毅是共产党人，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敢和国民党对抗。而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和党政大员已弃城弃官而退，共产党反其道而行之，从后方来到敌后抗日，不能不令人敬佩。

陈毅被请进客厅，只见一个身材颀长、脸面白净，穿一身浅色派力司长衫的人从里面走出，不用问，他就是纪振纲了。

“一切客套收起，报名，我叫陈毅，四川乐至人氏，哈哈……欢迎吗？”“欢迎，欢……”

经多见广、沉稳镇定的纪振纲，被陈毅如此爽朗快捷的气质，冲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连忙掏出名片：“鄙姓纪……”

落座后，纪振纲才恢复绅士风度，慢条斯理地说：“陈司令豪气过人，快人快语，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过象你这样爽快的人。”

“我也佩服先生，日本人找你的麻烦，你不亢不卑，不愿做亡国奴；‘忠救军’给你高官，你不理睬，武装自卫，我佩服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有想到共产党的将领对他如此了解，既高兴又感动，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仅是洁身自好而已。”

陈毅诚恳地说：“日蹄踏遍大半个中国，到处狼烟四起，尸横遍野，全民族都在抗战，纪先生想走中间道路，过桃园生活，恐怕时局

不允许。纪先生是创业家，对‘新’字头的东西是会感兴趣的。”于是，陈毅滔滔不绝地介绍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见纪振纲听得十分专注，顿了顿，加重语气说：“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我们认为争取这种胜利的关键是在于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今天到纪先生这里来，就是希望纪先生能踊跃参加到全民族的抗战行列中来。”

纪振纲犹豫了一阵之后，长叹一声说：“是啊，抗日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本分。不过，我和陈司令不同；你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我40万投资，20年经营，偌大一个茅麓公司啊！”陈毅起身告辞时，纪振纲又说：“当然，请陈司令放心，鄙人不会做汉奸，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会支持抗战的。”

陈毅把联络争取地方武装的情况写信告诉项英，项英指示说：“……中心是争取同我们一块抗日，达到统一指挥，建立纪律，洗刷坏分子，学习和开展游击战。我们除此以外，主要加强政治教育和领导，不仅在名义上归我们指挥（如情形复杂，开始并不强求归我们，仍以地方名义而能随我们行动，在行动中听指挥），而最重要的是争取在我们政治领导下，进一步派人到里面去作政治工作，在行动上受我们指挥和共同行动，创造为我们部队新的基础，并逐渐吸引一部编入我军，本身继续扩大。最基本的是在他们中间发展党、建立党，以树党的领导。”对纪振纲的争取，项英指示说：“纪振纲部也可根据此原则运用。目前可从积极上要他抗日，特别是争取部下和周围群众，以揭破其两面派的态度，才能达到目的。”

项英的这些意见是有效的，仅个把月功夫，陈毅已联络争取3000多人枪。纪振纲虽然犹豫再三，但终于把他的自卫团交给新四军，他本人也走进抗日行列，成为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防匪总会副主任（后改为抗敌总会）。

对第三战区任命的“江南游击第一挺进支队”朱永祥的解决，是陈毅与项英共同完成的。南京失守后，原国民党败退军官朱永祥，跑到苏、皖边界小丹阳拉起了上千人的队伍。小丹阳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的活动地区，顾祝同给朱永祥番号，是想让他为牵制新四军出点力。陈毅也曾真心争取他合作抗日，除多次给他写信外，还3次派副官代表自己去小丹阳与他谈判。谁知朱永祥反共本性难改，有意与新四军为敌，与石白湖边的川军余宗臣部狼狈为奸，处处给一困制造麻烦。另一方面，朱永祥还偷偷与日军来往。同时朱部纪律极坏，群众称之为“小日本”。陈毅以确凿的证

强烈的认同感

是爱国主义的前提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1994年9月19日在《求是》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时谈到,怎样使人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真正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它的前提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员具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至少包含两个方面:共同的回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正是有了这些共同的因素,才会产生一种向心力,把人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凝聚成一股难以分开的巨大力量。

共同的回忆,指的是过去。某一个人,在祖祖辈辈地生活在同一土地或环境中,一起战天斗地,从事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留下无数扣人心弦的历史记录和传说。这种共同的回忆,就会在彼此间无形地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感情联结和亲和力。就连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会激发起人们无限的眷恋之情。这种思想感情是在千百年的漫长岁月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所蕴藏和产生的那种力量,是其他力量难以替代的。

共同的利益,指的是现在。也就是说,它的各个成员(更准确地说是,它的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

当年抗日救亡运动中,只要一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首雄壮的歌曲时,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新中国成立后50年的经历,更使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国家和民族实现了独立、统一和繁荣富强,个人才会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相反,要是国家陷于贫困、衰败和动乱之中,也就没有什么个人的幸福生活可言。如果只有对以往的共同回忆,而没有这种现实的共同利益,即便彼此间存在着某些亲切感,仍不可能凝聚成一股难以分开的巨大力量。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深厚的源泉所在。

共同的目标,指的是未来。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要同心同德,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而努力。今天,我们正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甚至包括着种种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同样需要万众一心,集中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去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而奋斗。

(摘自《求是》1994年第23期)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那贡恩在《求是》杂志1994年第23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邓选》一至三卷的体会文章中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告诉我们,生产力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里,

由于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变革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斗争成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革命成了带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但是,阶级斗争的直接动力作用仅限于阶级社会,超越了这一个范围,把它普遍化是十分错误的。在阶级斗争仍然是个严重事实的时候,忽视阶级斗争,把生产斗争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是不对的。但是,一旦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成为过去,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放生产力已不再成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强调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不及时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地树立依靠发展生产力来继续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就必定会走上歧途。

(摘自《求是》1994年第23期)

的动力问题

关于社会发展

□党史文摘

项英拿着电报去找顾祝同,顾祝同面子上过不去,电令将其撤职。以后朱永祥仍与日军接洽,准备公开投敌。顾祝同接项英报告,只好同意新四军就近“监视”。谁知电令刚去,朱部就被解决了。陈毅遵照项英“如朱再不奉从上令,可将其违令情形报上峰,同时相机将其拘押,报告上级解决”的指示,直接给顾祝同发来电报,云:“……江南游击第一挺进支队朱永祥部,纪律最坏,欺凌群众不亚匪寇。近奉战区司令长官部令,将其撤职。拒朱逆不唯不思悔改,反派其参谋长林楚才去南京与日寇接洽叛国。本月6日,敌派伪军200余人,到朱门附近接应朱逆叛变。幸本支队奉到司令长官电令,对该部严格监视,一面派队配合民众武装,分途截击朱逆,当将朱部全部解决。朱逆永祥及其副司令韩永昌、参谋长林楚才,均已捕获,奉令解送司令官部办。”

顾祝同看完电报,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股强烈不安的情绪紧紧抓住了他。他不相信朱部是在投敌途中被一支队截击的。他断定,这是新四军陈毅搞的鬼。他深悔自己做的表面文章被陈毅利用了。近些日子,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多次提醒他新四军在江南搞“赤化”,减租减息,派粮派款,抓丁拉夫,煽动民众等等,并把一份份“状纸”给他看。开头,顾祝同认为自己在江南布置周密,并不十分在意,他估计,陈毅、粟裕在江南呆不了两个月。谁知一个多月来,新四军不但没有被鬼子消灭,反而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许多鬼子,而且越战越勇,仗越打越大。那些“游击队”对他们也不起作用,倒是投靠他们的越来越多。顾祝同感到事情有些严重。

(责编 启元)